



OSID

## 《还乡杂记》版本批评

苏晓阳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1)

**摘要:**《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第三本散文集,自20世纪30年代末问世以来先后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经历了跨地区、跨时代的多次修改。运用版本批评的理论方法,系统梳理《还乡杂记》版本的变迁历史,概括分析其修改内容,讨论时空变迁背后的政治话语、文化机制对文学文本生成的影响,探寻何其芳的自我改写与重塑过程。

**关键词:**何其芳;《还乡杂记》;版本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4)01-0058-08

《还乡杂记》散文集是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何其芳“一个更偶然的结成的果实”<sup>[1]</sup>,收入其中的9篇散文,描绘了作者1936年共计13天返乡途中的旅程见闻以及由此生发怀想的童年纪事。作为学界公认的何其芳思想与艺术转折时期的代表作,《还乡杂记》在展现二三十年代川渝社会图景的同时不失个人化的自我反思,具有文学和史料的双重价值。但《还乡杂记》并非一开始就完整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是一本多灾多难的小书”<sup>[2]316</sup>,初版本原稿丢失,再版本惨遭删改,直到第3次出版才由作者从头校读补正,是为文丛本,后续的文集本又对部分篇目进行了修改。然而,面对内容发生过较大变动的文本,相关批评研究<sup>①</sup>绝大多数都忽略了版本的动态演进,直接以文丛本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试图运用版本批评的理论方法,系统梳理《还乡杂记》版本的变迁历史,概括分析其修改内容,讨论时空变迁背后政治话语、文化机制对文学文本生成的影响,探寻何其芳的自我改写与重塑过程。

### 一、《还乡杂记》版本变迁史

1936年暑假,何其芳和妹妹何频伽从北平回到重庆万县老家探亲。在往返途中,万县县城以及乡下家里,何其芳目睹了家乡人事的常与变,对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开始了重新思考。后来,他又“带着一种凄凉的被流放的心境”<sup>[1]</sup>来到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城莱阳任教,看到无数人辗转于饥寒困苦之中,

对个人主义思想进一步产生怀疑。这时,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询问他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章并发表。回想返乡路途的所见所闻和工作之地的所感所思,何其芳“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sup>[1]</sup>,即抄写过去的记忆,用几篇散文漫的文章描写出家乡的一角土地,这就是后来的《还乡杂记》。初刊本作为最早见诸公众的文本,最能代表作者当时的思想。写作时间、发表顺序及刊载报刊,如图1所示。

1937年6月,何其芳将已发表的9篇散文编辑在一起,以《我的散文》作为代序,寄送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拟作为靳以所编丛书《现代散文新集》之一出版。然而,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良友公司内部也发生了巨大人事变动,编者靳以离开良友去了重庆,《现代散文新集》后续三本书的出版变得异常困难。之后,以赵家璧为首的良友职工重组良友并将其改名为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继续“现代散文新集”的出版,丛书第七本即何其芳的《还乡日记》,是为《还乡杂记》初版本,出版时间为1939年8月。作为首次出版的单行本,《还乡日记》在书名和篇目上尤其值得注意。就书名而言,“还乡日记”并非何其芳拟定的散文集名称,他所拟定的原为“还乡杂记”,初刊本的副标题以及具体行文中已多次出现。就篇目而言,初版本《还乡日记》仅收入《我和散文(代序)》《呜咽的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

收稿日期:2023-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作者简介:苏晓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文学地理学。

《我们的城堡》6篇文章,其中《我们的城堡》只印了一个开头。何其芳发现这些问题后很不满意,

他立刻给靳以写了一封信,请求靳以转告书店停止再印,以减少错误传播。

篇名	写作时间	发表报刊	发表时间
《呜咽的扬子江》	1936年9月29日	《中流(上海1936)》1936年第1卷第4期(222-226页)	1936年10月20日
《街》	1936年10月15日	《大公报(天津)》1936年11月29日(11版)	1936年11月29日
《县城风光》	1936年11月1日	《文季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55-59页)	1936年12月1日
《乡下》	1936年11月25日	《大公报(天津)》1937年3月7日(11版)	1937年3月7日
《我们的城堡》	1937年3月31日	《国闻周报》1937年第14卷第12期(71-76页)	1937年3月29日
《私塾师(散文)》(附图)	1937年3月31日	《新少年》1937年第3卷第7期(20-25页)	1937年4月10日
《老人》	1937年3月31日	《文学杂志(上海1937)》1937年第1卷第2期(141-148页)	1937年6月1日
《我和散文》	1937年6月6日	《大公报(天津)》1937年7月11日(11版)	1937年7月11日
《树阴下的默想》	1937年6月11日	《文学杂志(上海1987)》1937年第1卷第4期(130-136页)	1937年8月1日

图1 何其芳《还乡杂记》初刊本发表情况

1942年12月,在何其芳友人方敬的不懈努力下,《还乡杂记》再版本于桂林工作社出版,书名为《还乡记》。方敬曾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成都自办《工作》(半月刊),“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sup>[3]</sup>,来到桂林后依旧以“工作”为名组织小型出版社。《还乡记》是工作社的第一部作品,编辑方敬、发行人何昭宁(何频伽)、发行者大地图书公司。在方敬看来,初版本《还乡日记》的疏漏“对作者与读者都是一个损失”,身为挚友他们“一直想重印”,以“获得一个完整”<sup>[4]</sup>。再版本《还乡记》从篇目来说确实完整,包括代序在内的9篇散文均在,最后还刊载有方敬所写的《附记》。然而经过仔细校读就能发现,《还乡记》中的篇章段落被大量删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桂林当局因皖南事变而逐渐向国民党靠拢,加强了文化统治政策的执行力度。方敬的心愿最终未能实现,《还乡杂记》至此依旧以支离破碎的样貌存在于世,文意含混,甚至有些地方不知所云。

1946年6月,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打算重印该书。借着重印的机会,何其芳百忙之中从头到尾校读一遍,才发现再版本《还乡记》存在严重的删削问题。在经过与初刊本、初版本的核对并抄录完文稿之后,何其芳将书稿从重庆寄给巴金,并特意写作《附记三》,对《我们的城堡》等文章的删改情况大致进行了勾勒,“为着给将来做文网史者留下一点材料”<sup>[2]317</sup>。同时,他将1944年见到这本书

后所写而被昆明检察官修改过的短文《关于〈还乡记〉》作为《附记二》,将方敬在《还乡记》中缩写的《附记》作为《附记一》,一并编入散文集,试图呈现《还乡杂记》的出版史,也留下“对于检查制度永远的诅咒”<sup>[2]319</sup>。1949年1月,《还乡杂记》作为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八集出版,是为文丛本,学术界在研究该散文集或出版社在不断重印时,基本都选择这个版本。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还乡杂记》同样有两大方面的变动。一是主编巴金没有沿用再版的“还乡记”为题,因为沙汀已有一本题作《还乡记》的长篇小说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年7月),为了避免混淆,巴金将何其芳散文集题名确定为《还乡杂记》,这正好恢复到初刊时的名称。除此之外,巴金还将何其芳控诉国民党检查制度的《附记三》删去,换为自己所撰的《后记》,仅在后记中交代是“因了某种关系被我删去了”<sup>[5]111</sup>。

1957年3月,何其芳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编选的《散文选集》出版,收录有《还乡杂记》中的5篇散文,分别为《街》、《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和“《还乡杂记》代序”,并对文本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可将其称为文集本。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不难理解何其芳对于《还乡杂记》篇目的挑选与修改。五十年代的何其芳,思想态度及艺术观念与写作《还乡杂记》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断深刻地反思自己、反思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不断否定

“少作”。

2000年5月,蓝棣之主编的《何其芳全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还乡杂记》收入全集第一卷。全集在编排上主要遵循了体裁和编年相结合的原则,蓝棣之在序中明言:“这部全集的体例,我们以何其芳所出版的单行本为单位,再按照作者写作时间的先后加以排列,分卷时适当参照文体……最重要的,是保留了原来单行本的面貌……因此相对完整。”<sup>[6]</sup>对于蓝棣之来说,真实再现文学史料、完整提供文学遗产,是编者的主要任务。根据全集本记载,收入《何其芳全集》的《还乡杂记》以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文丛本为底本,补充被主编巴金

删去的《附记三》,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现阶段最为完整的版本。

总之,《还乡杂记》自问世以来,先后出现了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文丛本、文集本、全集本等不同的版本。经前后版本对比发现(详见表1):初刊本到再版本以及再版本到文丛本的改动最大;文丛本到全集本虽没有较大的修改,文集本却也以作家亲自编选的特殊性显示了时代语境和个人遭际对文学实践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从初刊本到再版本”、“从再版本到文丛本”和“从文丛本到全集本”三个阶段作为比照对象,进行版本差异的呈现、阐释与研究。

表1 何其芳《还乡杂记》单行本出版情况

书名	版本名称及出版时间	收录篇目情况
《还乡日记》	初版本(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8月)	“现代散文新集”之一,靳以编辑。本书是《还乡杂记》的残本,书名误为《还乡日记》。收有《我和散文(代序)》《呜咽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6篇,缺漏《我们的城堡》后半篇以及《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3篇
《还乡记》	再版本(桂林工作社,1942年12月)	再版改订本,改书名为《还乡记》,方敬编辑。收有《我和散文(代序)》《呜咽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全部9篇,但受检查机关限制,进行部分删改,书后有方敬所写《附记》
《还乡杂记》	文丛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	“文学丛刊”之一,巴金主编。收有《我的散文(代序)》等完整9篇散文,是《还乡日记》(上海初版本)和《还乡记》(桂林再版本)的改订补充本,成为后来的通行定本。书后有《附记一》(远兹,即方敬)、《附记二》(作者)、《附记三》(作者)、《后记》(巴金)
《还乡杂记》	全集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以文丛本《还乡杂记》为底本,存在一些字词句的修订。书后除《附记一》《附记二》《后记》,另有在文丛本中被巴金删去的《附记三》(作者)

## 二、从初刊本到再版本:战争环境和审查制度的限制

由于初版本发行受战火影响存在原稿丢失和讹误更名现象,将发表在各大报刊的初刊本与初版本《还乡日记》进行对校时,共对校了《我和散文》等5篇完整文章和《我们的城堡》开头段落,出现30处<sup>②</sup>异文<sup>③</sup>。同样由于上述原因,初版本《还乡日记》与再版本《还乡记》的对校也局限于上述篇目,再版本《还乡记》在初版本《还乡日记》的基础上存在94处<sup>④</sup>异文。从初刊本到再版本的版本变迁,可以看到战争环境和审查制度对文学活动的限制。

从初刊本到初版本,主要是战争环境对印刷生产的束缚。1937年7月,日军开启全面侵华战争,上海的出版机构因此几遭损毁,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最终改组为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还乡杂记》书名的误记与散文篇目的丢

失很难不令人叹惋,《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4篇文章直至1942年才被收录在集中。

初版本《还乡日记》书名和篇目的错印与漏印,对散文集的完整性造成了极大破坏。由初刊本的发表顺序可知,何其芳对《还乡杂记》的篇目安排有着总体布局和宏观把控。《我和散文(代序)》定调,说明自己的创作观念、思想变化和写作动机。《呜咽的扬子江》进入正题,随着时间流逝,从返程的汽船到县城的风光、到乡下的家景,再到家乡的人事,用流畅的诗意语言勾勒着返乡的旅程和辽远的记忆,句段、篇章前后呼应。如第一篇《呜咽的扬子江》从狭隘的峡间的急流中,“我听见了一只呜咽的歌,不平的歌,生存与死亡的歌,期待着自由与幸福的歌”<sup>[7]</sup>;最后一篇《树阴下的默想》,“在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的时候,我幻想它是渴望的愤怒的奔向自由的国土,又幻想它在呜咽”<sup>[8]</sup>。两相

映衬,寄托了何其芳对家乡的满腔爱意,怒其不争。初版本《还乡日记》中篇目的散失,抹去了作者创作伊始的精心构思,因此被作者要求停印。

从初版本到再版本,主要是审查制度对图书发行的制约。193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规定“送审之图书杂志原稿,其言论完全谬误者,停止印行。一部分谬误者,应遵照指示之点修改或删削后,方准出版”<sup>[9]250</sup>。由此可知,再版本《还乡记》属于“一部分谬误者”,检查机关对其进行了删削。对比校读又会发现,再版本的删削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删削的内容在后续版本中得到恢复;其二,删削的内容在后续版本中依旧未能得到恢复。这两种情况最终都造成了文气不接、无法正确理解文章内涵等问题,方敬等人费尽心力搜寻出版的再版本《还乡记》最终未能“获得一个完整”<sup>[4]88</sup>。

其一,删削内容在后续版本中得到恢复。《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私塾师》5篇文章<sup>⑤</sup>在再版本《还乡记》中都出现了大段的删除现象,后续大多得到恢复。其中,《街》被删去2句话、《县城风光》被删去2段1句话、《乡下》被删去5段、《我们的城堡》被删去23段、《私塾师》被删去半段,共计34段,主要涉及军阀、匪徒和鸦片等3类描述,以军阀描写列举如下:

“他到了这县城不久便把那一圈石头垒成的古城垣拆毁,以从人民的钱袋里搜括来的金钱,以一些天知道从哪儿来的冒牌工程师开始修着马路,那些毒蟒一样吞噬了穷人们的家的马路。……我想起这件事并不是责备那位现在已流落到川省偏僻处的军阀……”<sup>[10]66</sup>

1937年颁布的修正版出版法规定:“出版品不得为下列各款言论或宣传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sup>[9]137</sup>国民党政府虽然强制宣传“三民主义”,但在思想和文艺界缺乏具有影响力的“领头人”,只能依靠严密的文网检查制度来监控舆论。对再版本《还乡记》三类内容的删削,可能是当局认为对匪徒作乱、兵匪不分,军队受贿、军阀集权,药膏难禁、鸦片猖狂等社会现实进行描述,会影响国民党军队乃至政府形象的塑造,造成民众恐慌甚至暴乱;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工作粗疏,为避免出现审查遗漏,一旦出现敏感字眼就全部删去,以减少担责的可能性。不管何种原

因,这些做法都是对作品原文的一种破坏。

实际上,国民党检查制度法律条文模糊不清、规章制度自相矛盾,很多书稿却因此遭受“无妄之灾”,是战时出版审查对文学生产活动的大规模破坏。就再版本《还乡记》而言,删改过后文气淤塞、文意混乱。《街》的开头讲何其芳七八岁时,“四川东部匪徒很多,或者说成为匪徒的兵很多”,“骚扰得人民不是躲避在寨子里便逃往他方”<sup>[11]</sup>,用平实的话语解释了自己幼年时期不断搬家的原因。再版本删去描写匪徒的这句话,直接以“我七八岁时,在万县这素称富足的一等县里,更骚扰得人民不是躲避在寨子里便逃往他方”<sup>[4]28</sup>作为开头,使人不知所云。何其芳对这种检查制度表示过强烈不满,他在重印文丛本《还乡杂记》时就撰写《附记三》将被删削的内容进行了大致总结,对一些无法补正的文稿也“让它带着伤痕存在,作为对于检查制度永远的诅咒”<sup>[2]319</sup>。可惜的是,作为控诉的《附记三》在文丛本出版时,再次由于编者躲避检查制度而被替换。

其二,删削内容在后续版本中未能得到恢复。虽然目前找不到直接解释这种现象的史料证据,但根据删除内容(团部绑票敛财,军阀控制教育,海洛因、赌博和妓女,英国军舰炮击万县事件)和巴金在《后记》中的说明,大概仍可以认为是出版审查对文学作品的强力制约。经过对校发现,共有7处删削未能得到恢复,包括《街》中描写团部和军阀的2处内容和《县城风光》里描写陋习及炮击的5处内容,其中军团1处、军阀1处、陋习2处、炮击3处,以炮击事件为例,列举如下:

“……并且在十年前这个县城和它的住民便承受了一次大不列颠帝国的兵舰上的炮弹”<sup>[10]58</sup>;“十年前大不列颠帝国兵舰上的炮弹对这县城所施行的燃烧和杀戮谁还常记在心里呢”<sup>[10]70</sup>;“……我说不清那白种人的疯狂行为在我们幼小的心上划着怎样巨大而深的创痕”<sup>[10]72</sup>。

删削内容未能得到恢复,除了曲解文意、对理解作者原意产生消极影响,也拒绝研究者走进历史真实,发现作家思想转变根源,进而发掘作家作品风格变化的内外因素。“万县惨案”即其中一例。何其芳遗作《忆昔》14首,概括了他一生波澜起伏的生活经历和由这些生活经历带来的思想及艺术转变基础。其中,第2首便提到1926年英国军舰炮击万县事件:“长悲文采风流地,竟被商船炮舰羞。”<sup>[12]</sup>从诗

歌所占篇幅已能看出炮击事件对何其芳本人成长发展的影响：“他日惊雷驱急雨，何人歌咏满神州？”<sup>[12]</sup>根据《还乡杂记》的描述，炮击事件发生时他刚从乡下私塾来到县城中学读书，在人事生疏的情况下亲历这场灾难，对此感受很深，满腹屈辱。文网检察人员却将作者对惨案的刻画、对“白种人”的批判及自我反思全数删去，试图遮蔽真相，自欺欺人以获得苟安。

### 三、从再版本到文丛本：艺术完善和思想变迁的呈现

作为单行本中唯一由作家修改润色过的版本，文丛本《还乡杂记》与其他版本差距最为明显。对校再版本《还乡记》可知，文丛本《还乡杂记》共有109处<sup>⑥</sup>异文。参考使用《文学文本四维论》<sup>[13]</sup>中“横”的维度，不妨将其分为正文本的修改和副文本的重构，两者共同构成作家艺术完善和思想变迁的生动呈现。

一方面是正文本的修改。正文本是文学作品的主体部分，“更典型地体现着文学的本体特性”<sup>[14]</sup>。何其芳对文丛本《还乡杂记》正文本的修改主要包括校正再版本中存在的各种缺憾，以及对文集进行艺术上的加工完善，表现如下：

其一，文丛本《还乡杂记》修订了再版本《还乡记》中出现的错字、漏字等印刷出版问题，同时将受检查机关删削的众多段落按照原稿进行补充。如再版本中错印的“带是着”、“脸面前未来”、“仍燃”、“多转”、“教育都”、“是过”和“迷在信”等词句被改回“是带着”、“脸面前的未来”、“仍然”、“反转”、“教育部”、“见过”和“在迷信”等，约有16处；漏印的“个人主义”、“栖止”、“乡下去了”、“某田主”和“温和的沉默”等短语得到补充。再如恢复受国民党文网检查制度破坏甚至颠倒文意的篇章段落，以《我们的城堡》最为明显，曾“被割掉23段之多”<sup>[2]318</sup>。

其二，文丛本《还乡杂记》增删或替换了一些字词、句段，削弱了散文的方言语境与口语腔调，使得文字表达更加简洁、书面用语更加规范。字、词的修改如“描画”改为“描写”、“委靡”改为“萎靡”、“蠢愚”改为“愚蠢”、“希少”改为“稀少”、“念九日”改为“二十九日”、感叹词“呵”统一改为“啊”等，遵照了当时的规范表达。此外，常见人名和专用名词同样也按照用语习惯进行了替换，“左勤科”、“西北利亚”、“领江”分别为修改为“左琴科”、“西伯利亚”和“领港”。句、段的修改如《老人》中刻画武秀才出身的祖父好友直至年迈仍然保持健壮体格和对武术的热爱，纠正了明显的语法错误：

“他自己也很老了，却有着一种不应为那样喜欢谈着与武艺有关人所有的宏亮的语音，而且那样的事物。”<sup>[4]77</sup>（再版本《还乡记》）

“他自己也很老了，却有着一种不应为老人所有的宏亮的语音，而且那样喜欢谈着与武艺有关的事物。”<sup>[5]88</sup>（文丛本《还乡杂记》）

其三，文丛本《还乡杂记》除了不影响文意的上述修改，也存在一些关涉文章理解的改动，展现了何其芳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思想变迁。《我和散文（代序）》开篇，“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偶然”<sup>[4]1</sup>调整为“我的生活里充满了愤怒”<sup>[5]1</sup>，结合作家本人生活经历与思想发展，能够知道作家修改此文时已由独自“画梦”的个人主义转向点燃“星火”的集体主义；《街》的中段叙述学生运动，将“群众的惩罚”“群众的手中”<sup>[4]32</sup>删改为“惩罚”“人们的手中”<sup>[5]22</sup>，削弱散文的政治性表达，使行文更贴合人民大众，是作家知识分子改造的表白；《树阴下的默想》形容旧友对自己的重要意义，从“影响到我的”<sup>[4]80</sup>改为“第一个影响到我的”<sup>[5]92</sup>，程度加深，可以看出作家思想情感的变动，表现了何其芳对友人与日俱增的亲近与爱重。

另一方面是副文本的重构。副文本“总体上更具史料价值”，“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建构等皆有正面的意义”<sup>[14]</sup>。与再版本《还乡记》相比，文丛本《还乡杂记》在副文本方面的变化除了编辑巴金对标题和序跋的2处修改，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由作者在1944年所写的《附记二》。综合论之，《附记二》与正文本的修改相比更能体现何其芳思想的嬗变，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更为深远，表现如下：

其一，何其芳在《附记二》中对《还乡杂记》进行了批判，是典型意义上的“悔其少作”。他认为，《还乡杂记》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宣言关心人间，但实际上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充斥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独语”。他也直截了当地在文中呈现了自己思想的变化，宣布与人民大众和共产主义并肩：

“……所有这些都不仅说明了知识分子未和群众结合以前的怯懦，无力，同时也说明了我当时的无知。那真是既不知道人类的历史，也不知道人类的现状，更不懂得人类必然的发展与前途。……人民大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一直都是历史和世界的创造者，而今天他们的力量与创造显得更鲜明。”<sup>[5]108</sup>

1938年,出于对精神桎梏的反抗和对现实革命的向往,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来到延安,开启了个人的长期磨练。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何其芳更是自觉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南,否定过去自我陶醉的道路,在理论学习中检讨和改造自己,试图通过思想改造脱胎换骨。不必观察何其芳此期的文学创作,仅从这篇《附记二》的写作便能窥得一二,它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作家在世界观和立场情感方面的彻底转变。

其二,长期以来,有关何其芳思想艺术转折点的划分一直是何其芳研究的热点话题。一些研究者认为《还乡杂记》已经标示着何其芳思想艺术向社会现实的靠拢,“在个人感知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的认知”<sup>[15]</sup>,将《还乡杂记》列为何其芳的后期创作;另有一些研究者,将《还乡杂记》与《画梦录》并提,认为二者都是何其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期的产物,“是作者在压抑和苦闷中把自己关在寂寞、欢欣的小天地里,细细描画的关于爱情、理想、人生的远离现实世界的梦”<sup>[16]</sup>,属于何其芳的早期创作。阅读《附记二》可知,《还乡杂记》与《画梦录》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情感模式是相同的:

“以我现在的目光看来,这本散文集子在艺术上,在思想上都是差得很的。这只是一个抗战以前的落后的知识青年的告白。他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但还未找到明确的道路,还带着浓厚的悲观气息和许多错误的思想。仅有的积极意义大概就只有这样一点点:从这个作者极其狭隘的经历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不合理得很,需要改造。”<sup>[5]104</sup>

事实上,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何其芳离开自我梦幻的天空,在犹疑与矛盾中艰难跋涉,才最终落脚在广阔坚实的大地。“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一个被沉重的精神枷锁禁锢得紧紧的青年。他比一般的年轻人有着更多的精神负担。”<sup>[17]</sup>

#### 四、从文丛本到全集本:时代语境和个人遭际的影响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何其芳编选《散文选集》,他便从诸多散文集中抽出部分文章,集结成册。何其芳在序言中提到收入选集的标准:“那时候写的短文,内容太坏的自然没有选,就是入选的

几篇,也仍然是带有当时的思想落后的色彩的,只是今天看来过于刺目的谬误的地方,我略为作了一些删改。”<sup>[18]</sup>选集本《还乡杂记》由何其芳亲自修改,也是这5篇散文的最后一次修订。因此,除了单行本的版本变迁外,该选集本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将收录进册的《还乡杂记》5篇散文与文丛本进行对校,文集本共出现99处<sup>⑦</sup>异文,是除再版本到文丛本外改动最大的版本,作家借此向外界表明身份的转变,同时显现出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变化。

一方面,选集本对《还乡杂记》的篇目选择受到时代语境和个人遭际的影响。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相继开展,在此背景下,何其芳的地主出身与小资身份显得尤为敏感。诸如《乡下》《我们的城堡》此类大篇幅描写家庭殷实背景的作品自然不能被选入其中。同时,已经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的他,无法容忍旧作中呼之欲出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于是,《呜咽的扬子江》《县城风光》也被删去。留存下来的5篇散文,是何其芳50年代思想的显露。

另一方面,选集本对《还乡杂记》入选各篇文章内容的修改也受到时代语境和个人遭际的影响。其一,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何其芳删削了《还乡杂记》的自传性文字,以淡化他的出身,寻求人民大众的认同感。比如《老人》中删去:“为了我的父亲或我的祖父并不是一个穷人,我遂被石的墙壁囚起来。”<sup>[19]</sup>其二,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使者”,何其芳此时的文艺思想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标准,强调文学的阶级意识,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sup>[6]16</sup>。因此,他将文丛本《街》中“那时候人们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sup>[5]20</sup>在文集本中改为“那时候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sup>[18]40</sup>,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出身、对准了自我,对祖父与父亲的批判也是对自我的批判与改造。其三,持续的思想改造使何其芳发自内心删削修改了散文中有关“个人主义”和悲观思想的内容,强化集体主义与“工作论”思想,行文比三四十年代更加坚定果决。仅《〈还乡杂记〉代序》一篇,就有7处修改删削与上述原因有关,以个人主义列举如下:

“……写一个长篇小说作为个人主义的辩护……”<sup>[5]</sup>

“……因为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sup>[18]73</sup>

“……写一部长篇小说……”<sup>[5]</sup>

“……因为一个诚实的人……”<sup>[18]78</sup>

文丛本之后,《还乡杂记》的书名终于确定下来,成为固定称谓,收入《何其芳全集》的版本即以此命名。全集本以文丛本为底本,根据作者原意补入《附记三》,以巴金所撰《后记》收束全书。主编蓝棣之认为“《还乡记》这名字更适合这本散文集”<sup>[2]236</sup>,但为了保持何其芳文学遗产的完整性和历史的原貌,他在编选时“未对收入全集的任何文章进行删节修改”<sup>[2]239]</sup>,保留了《还乡杂记》的书名。同样出于上述原因,他在编选全集时也并未沿用作者何其芳对文集本的亲自修订。

较之其他单行本,全集本《还乡杂记》经历的最关键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权的更替、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文学规范的出现都影响了《还乡杂记》的版本变迁,全集本因此产生的最直观的变化是在排版上由竖排改为横排、在字体上由繁体转为简体。与文丛本进行对校,全集本又修改了38处<sup>⑧</sup>,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汉语规范化运动推行的字词和用语规范方面的调整。

首先,汉语规范要求对字词、口语、方言的更换与调整,不存在句意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语言的规范化视为亟待建立的新秩序之一。1956年,汉语规范化运动正式启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为词汇和语法的使用确定了规范原则,《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为汉字简化和异体字的整理明确了具体要求。全集本《还乡杂记》在此方面的修改主要包括:“想像”改为“想象”共9处;“唯一”改为“惟一”共7处;“糊涂”改为“糊涂”共3处;“搥打”改为“捶打”,“发见”改为“发现”,“梭标”改为“梭镖”,“安靖”改为“安静”,“叔父们”改为“叔叔们”,“含糊”改为“含糊”。这些改动,既有助于形成统一的现代文学语言、维护新的文学规范和国家秩序,又为当代读者的阅读提供便利。

其次,增删字词、调整句段、纠正语法错误,使句意更加通顺、文意更加明确。这方面的修改有11处。如《我和散文(代序)》中“干燥的紊乱的理论书籍”改为“枯燥的紊乱的理论书籍”,换用了更准确的形容词,契合当代用语习惯;《呜咽的扬子江》中“是从上海直航”改为“是在上海直航”,明确船舶的航行线路,更好地佐证散文主旨;《还乡杂记》中“从私塾到学校在我县城里”改为“从私塾到学校里我”,将明显的语法错误改正,疏通文意。其中,改动字数最多的是《我和散文(代序)》中描写同学翻译西欧作家作品的句段:

“……阿左林、纪德等人的文章,他们虽不止是散文家,称之为文体家大概是可以的……”<sup>[5]</sup>

“……西欧的一些讲究文体的作家……”<sup>[2]238</sup>

再次,全集本《还乡杂记》存在大量的标点符号修改,主要更换了书名号28处和双引号40处。作为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标点符号辅助文字记录语言,对标点符号的重新定规也成为新中国建立新的文学规范的重要环节。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横板印刷对竖版印刷的不断取代,《标点符号用法》的持续推行,新式标点符号走向成熟并逐渐定型。如双引号外观进行了修改,从“[ ]”变为““ ””;书名号从苏联重新引进,从“{ }”或“[ ]”变为“《》”。标点符号的修改虽未正式纳入本次版本研究的讨论,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书籍版(文)本的任何细微变化都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和作家生命体验。

最后,正如出版说明所言,“限于种种因素,全集在编辑和校勘等方面,粗疏错漏之处在所难免”<sup>[6]2</sup>,全集本《还乡杂记》修改标准未能完全统一。其一,全集本将《呜咽的扬子江》中受检查机关迫害的“X县”按照原意改回“万县”,其他篇目依旧保持“X县”的说法;其二,全集本将《县城风光》中的“发见”改为了“发现”,其他篇目仍用“发见”一词;其三,《我们的城堡》中“但在我得十五岁时我终于像安徒生童话里得那只丑小鸭离开那黑暗……”<sup>[2]289</sup>,按照通行的汉语规范,“得”应改为“的”。除此之外,经过4个版本的反复对校,发现全集本《还乡杂记》出现了1处错别字,《乡下》描写万县遭遇旱灾,“塘堰都放干了;溪里露着发渴的白石”<sup>[5]54</sup>,全集本误为“城堰都放干了;溪里露着发渴的白石”<sup>[2]279</sup>。

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作家全集的编选更应注意作品原貌的呈现。全集本《还乡杂记》虽然尽最大努力实现了“全”,但其底本选择一定意义上忽视了作品的原貌和作家的原意,或许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考量。

## 五、结语

何其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作家群体,同时代的他们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何其芳现象”,对何其芳的研究与发现其实是对那个时代的重新审视与再次挖掘,借由个案进入全局。可惜的是,现阶段对于何其芳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固定的几个话题,忽视了散文作品对理解作家思想转变和艺术调整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还乡杂记》版本变迁的完整梳理,得以窥见“知识分子改造典型”何其芳踟躇彷徨又果断坚定的一生。同时,笔者认为,初刊本是最具史料价值的“善本”。其一,初刊本包含了完整的9篇散文,在内容上没有缺漏,展现了何其芳一气呵成的创作思路。初版本和再版本在战争环境下发行,受出版审查的制约显著。其二,初刊本最能体现作家其时的世界观与文艺观,揭示了何其芳开启“脚踏实地”人生之路的重大跨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的文丛本、文集本和全集本,分别折射何其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及艺术转变,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还乡杂记》最初的意义。然而,初刊本《还乡杂记》至今未有单行本出版,亟待日后研究者和出版商共同努力。

#### 注释:

- ①例如张福龙《论何其芳的〈刻意集〉与〈还乡杂记〉》、胡天春《从“画梦”到“星火”——论何其芳散文创作的转变及原因》、姜艳《何其芳散文论》。
- ②每一篇的修改次数如下:《我和散文(代序)》6处,《呜咽的扬子江》7处,《街》6处,《县城风光》4处,《乡下》3处,《我们的城堡》4处(开头段落)。
- ③异文标准:标点符号和段落调整未纳入统计;字、词的增加、删减或更换为一处;字、词在一句中的词序变化为一处;增加、删减一句话或一段话为一处;连续段落的增删亦算作一处(一句以逗号分隔的字段为标准;段落修改以篇幅较大的改动为标准;除此之外零散分布的改动仍分别计数)。本文虽然按照此修改标准进行统计,但在具体统计中修改次数会有出入,难以做到绝对的准确,统计结果仅供读者参考。
- ④每一篇的修改次数如下:《我和散文(代序)》11处,《呜咽的扬子江》28处,《街》18处,《县城风光》14处,《乡下》11处,《我们的城堡》12处(开头段落)。
- ⑤因缘由相同,此处将初版本不存的《我们的城堡》和《私塾师》共同纳入讨论,与初刊本进行对校。
- ⑥每一篇的修改次数如下:《我和散文(代序)》13处,《呜咽的扬子江》20处,《街》14处,《县城风光》7处,《乡下》14处,《我们的城堡》16处,《私塾师》5处,《老人》6处,《树阴下的默想》9处,《附记》5处;再版本《还乡记》仅有《附记》,较文丛本《还乡杂记》少《附记二》和《后记》。
- ⑦每一篇的修改次数如下:《街》27处,《私塾师》28处,《老人》18处,《树阴下的默想》10处,《〈还乡杂记〉代序》16处。

⑧每一篇的修改次数如下:《我和散文(代序)》8处,《呜咽的扬子江》4处,《街》5处,《县城风光》6处,《乡下》1处,《我们的城堡》6处,《私塾师》2处,《老人》1处,《树阴下的默想》1处,《附记二》3处,《后记》1处;《附记一》无修改,《附记三》仅全集本存。

#### 参考文献:

- [1]何其芳.我和散文 我是怎样写起散文来的呢[N].大公报(天津),1937-07-11(11版).
- [2]何其芳.何其芳全集:还乡杂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J].新文学史料,1983(1):99-102.
- [4]何其芳.还乡记[M].桂林:工作社,1942.
- [5]何其芳.还乡杂记[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 [6]蓝棣之.何其芳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7]何其芳.呜咽的扬子江:还乡杂记一[N].中流(上海1936),1936-01-04(226).
- [8]何其芳.树阴下的默想 还乡杂记八[N].文学杂志(上海1937),1937-01-04(136).
- [9]刘哲民.中国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 [10]何其芳.还乡日记[M].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
- [11]何其芳.街 还乡杂记二[N].大公报(天津),1936-11-29(11版).
- [12]易明善.何其芳研究专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 [13]金宏宇,耿庆伟.文学文本四维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6(2):101-107.
- [14]金宏宇.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史料价值[J].北京社会科学,2014(2):36-40.
- [15]姜艳.何其芳散文论[D].扬州:扬州大学,2003.
- [16]胡天春.从“画梦”到“星火”:论何其芳散文创作的转变及原因[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
- [17]尹在勤.何其芳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18]何其芳.散文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19]何其芳.老人 还乡杂记七[N].文学杂志(上海1937),1937-01-02(144).

[责任编辑 游曼]